

大清的崛起

(下)

康乾煌煌两百载

任吉东等著

最后的中华帝国——解读清朝

纵观中国历史，辉煌五千年，历历数百年，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清朝这样，褒贬各执一词，盖棺尚未定论，带有众多疑案与悬念；也没有哪一段历史像清朝这样，风云千变万化，气象日更月张，充满无尽变数与抉择。清朝历史不仅书写了大朝崛起的神话，更演绎了没落王朝的悲哀，在她身上两者的结合是如此的浑然天成，毫无矫饰。

京华出版社

大清的崛起

(下)

康乾煌煌两百载

任吉东等著

最后的中华帝国——解读清朝

纵观中国历史，辉煌五千年，历历数百年，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清朝这样，褒贬各执一词，盖棺尚未定论，带有众多疑案与悬念；也没有哪一段历史像清朝这样，风云千变万化，气象日更月张，充满无尽变数与抉择。清朝历史不仅书写了大朝崛起的神话，更演绎了没落王朝的悲哀，在她身上两者的结合是如此的浑然天成，毫无矫饰。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的崛起：康乾煌煌两百载/任吉东等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24—397—7

I. 大… II. 任… III. ①中国—古代史—清代②帝王—政治—
谋略—中国—清代 IV. K249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3308 号

大清的崛起：康乾煌煌两百载(下)

著 者□任吉东 等著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印 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0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3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24—397—7

定 价□59.80 元(上、下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五章 雍正：承前启后（续）	（1）
第四节 非常语录：大话胤口奏折	（1）
第五节 不得善终：帝王死亡调查	（10）
第六节 骂名难副：雍正的辩护词	（17）
第六章 乾隆：盛世辉煌	（22）
第一节 最莫名的终极考问：我是谁？	（22）
第二节 最前卫的明星称号：“十全老人”	（27）
第三节 最深远的政治意图：六巡江南	（31）
第四节 最稳固的精英团队：“铁三角”	（34）
第五节 最遗憾的帝国机遇：东西初晤	（38）
第六节 最感人的万里归顺：土尔扈特	（41）
第七节 最失败的难言之隐：晚节不保	（44）
第八节 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 横空出世	（48）
第九节 “国粹”京剧：从“四大徽班”进京 说起	（52）
第十节 美仑美奂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圆明园 和避暑山庄	（55）
第七章 嘉庆道光：支撑犹壮	（60）
第一节 嘉庆：从皇太子苦等成儿皇帝	（60）
第二节 巨蠹覆亡：和口跌倒，嘉庆吃饱	（64）



第三节	癸酉之变：不入龙穴，焉得龙子	(67)
第四节	大烟泛滥：可耻的“福寿膏”	(70)
第五节	道光：小气天子厉行节俭	(73)
第六节	龚自珍：伫立在古、近代“十字路口” 上的巨人	(77)
第七节	魏源与《海国图志》：“睁眼看世界 第一人”	(81)
第八节	鸦片战争：不仅仅是商业之争	(84)
第八章 咸丰同治：江河日下		(89)
第一节	咸丰：有心作乐，无力回天	(89)
第二节	太平天国：不仅仅是农民起义	(93)
第三节	历史的逻辑：败落王朝与孤儿寡母	(96)
第四节	中兴第一臣：曾国藩和湘军、淮军	(100)
第五节	从“阴谋”到“阳谋”：慈禧的权术 之辨	(105)
第九章 光绪宣统：帝国陨落		(112)
第一节	戊戌变法：日暮帝国的最后一搏	(112)
第二节	义和团：自发地反抗侵略	(117)
第三节	亡国模式：又见孤儿寡母	(120)
第四节	蠹贼袁世凯：此权臣非彼权臣	(123)
第五节	皇帝下台：一役岂能功成？	(128)
第六节	宣统或溥仪：末代皇帝的悲惨命运	(131)
第七节	清末散文：古文的最后一次辉煌	(136)
第八节	传播与宣传：近代报刊出版业从诞生 到崛起	(141)
第九节	近代科技：从无到有，渐渐兴盛	(145)
后记		(155)



第四节 非常语录：大话胤□奏折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录，并不是雍正皇帝曾向全国颁行，并命民间广为宣讲过的他的三本“语录”，即《广谕圣训》、《御制朋党论》和《大义觉迷录》，也不是选辑古今各种禅宗经典和语录而成的《雍正御选语录》，而是他在批阅奏折中所抒发的或豪言壮语，或政务感言，或诙谐调侃。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代帝王的从政观念，还能领略到这位刻薄天子背后的幽默性情。

做实在好官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三年（1725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唯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事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正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漳州总兵初有德上了一个谢恩折子，满纸郁乎文哉，而且肉麻得可以。雍正阅后，连问三句：“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笔的？你识字通文与否？”毫不



留情面。

去庸人而用才干

为政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才干。在封建官场，很多官僚抱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既不贪污受贿，也不积极任事，雍正对此也作具体分析。他说：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难有起色。雍正帝知道后，立马就地“开”掉：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山东曹县知县到任一年多，疏于事务，倦怠公事，对二十多起命盗案竟没有一件审完，虽然他本人遵纪守法，但雍正认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犯罪，不仅免职，还让他坐了五年大牢。由此可见，雍正帝不仅要求官员们清廉刚正，而且要有真实的才干和作为。

雍正皇帝对于清除贪官庸人是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做事实的人却是倍加爱惜。河南大员田文镜尽心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诬告。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又让田文镜官升两



雍正皇帝未即位前的起居之所——永佑殿



级，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帝在刚即位一周年的时候，就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要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须为官清廉，但同时也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在封建官场上，确实存在着沽名钓誉的现象。清朝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名实兼收”。对此，雍正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杨名时因贪图名声，雍正帝就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雍正帝指责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度外”。福建陆路提督石云倬主动请缨，要求效力边廷，理由可谓冠冕堂皇。但雍正一语道破：“汝好起分外之念。”并指出石云倬所说的闽省“太平无事，兵民乐业”，并不是那么回事；又问石“毫无报效之处”是什么意思？不知轻重，不识好歹。最后劝他仍做好分内之事，莫生非分之想，否则，瞎动脑筋，有害无益。

莫恃才、莫自是，以谦存心，以和接物



雍正十分注重官员的操守道德，对此多有批示，反复教诲。陕西马尔泰巡抚上任，奏报谢恩。雍正告诫他：“勉之勉之。莫恃才、莫自是，以谦存心、以和接物。凡百务要静。过犹不及，不可生事。凡振作更张，兴利除弊之举，目下皆且可不必者。志之。”即不要恃才傲物，不要自以为是；要虚心待人，要谦和接物；要冷静处事，不要做过了头而惹出事端来。雍正的“三要三不要”，不仅是做官之道，也是为人处事之本。

山西巡抚石麟奏谢赏赐哈密瓜事，雍正也给他上了一堂哲学课：“操守乃为官之本，本立诸道自生。上天之善恶唯在公私二字，为国即为公，为己即为私，一涉私为自身利害计，便善事亦不能仰邀上天神明之鉴佑，何况其非善乎！若不贪利沽名作威作福，一派大公致身于国，何往何为而不蒙福也！试行看。鄂尔泰、田文镜等，无他奇异伎俩，不过根本上见得透、立得定耳，当勉之者。特此谕，亦令蒋洞知之。”什么是操守？操守落在善恶二字上，善恶又落在公私二字上，“若不贪利沽名作威作福，一派大公致身于国，何往何为而不蒙福也”。最后回到现实中来，指出鄂尔泰和田文镜之所以恩宠不衰，没有什么奇招，只是认准了一个“公”字，立定操守而已。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雍正帝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雍正帝素喜清淡，“御膳”常常是烧豆筋、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饭。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连李卫都感叹皇帝太清苦，雍正帝则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啊！”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即位后也没到江南做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雍正帝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

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大凡初到任，必过言地方之废驰；及迟数时必报言风习之整理，人人皆然，朕览之厌矣。何能慰朕远注之意也。但秉忠诚之心行诸力，黾勉为之。如果如所奏，不但朕必闻知，何能掩天下人之耳目也？不可为少有可观，或被人欺隐，无所闻见，以为已治已安而生懈弛念也。”意思是说，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这个伎俩我已经知道了，请不要再用了，很陈旧了。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笑的是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我行我素。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



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年羹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云南布政使葛森也是没事找事，频繁上奏。布政使是巡抚的部下，他越过上司不远万里直接给皇帝上奏，报告年成好，“米价大减”，不料挨了一顿臭骂。“实不知汝具何心志”，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要小聪明了。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



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张广泗虽为封疆大臣，但从未见过雍正面，故要求适当时候进京陛见。按理说，这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但雍正却认为督臣鄂尔泰被召见到京城，新署高其倬还不熟悉业务，这种时候奏请进京，动机不纯。提出为官者，“务诚之一字要紧”。

因地制宜，化裁取当

雍正帝作为一个洞察下情的皇帝，深知全国各地情况各异，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这一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即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单凭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



做官。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有许多错误，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和讲求实效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



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雍正有很多的批文充满个性化语言，有的像好朋友侃侃而谈，有的若知心人推心置腹，有的如家里人嘘寒问暖，有的似铁哥们调侃诙谐。在这里摘录几条，大家奇文共欣赏。

喜悦状：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

怨恨状：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默助，必获报复。

自谦状：此段河工，朕未获亲履其地，今向卿等论方略，可谓班门弄斧也。览奏朕实抱惭。又如批陈时夏折：灯下草笔，莫晒字丑文拙也。

亲昵状：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调侃状：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失望状：岂有此理！朕心寒之极，未料王士俊如此待朕也。

肺腑状：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尔等，凡有累民之举，概令据实入告。尔等竟若罔闻，政令乖方一至于此，朕惟仰天泪下，亦无言可谕尔等也。

讽刺状：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痛骂状：观汝屡次论奏，俱属狂妄不经，莫非尔身果有疯证耶！

玩笑状：大奇！大奇！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



自夸状：张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警告状：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

要酷状：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恶搞状：鼻烟壶装水。雍正三年，员外郎海望持出玛瑙桃式鼻烟壶一件。奉旨将口开大些，做水盛用。痰盂改棋盒。雍正五年，太监萨木哈持出象牙雕刻镶嵌铜镀金里痰盂二件，传旨，着将此痰盂改做棋盒，棋铜镀金里子拆下，另配做紫坛木痰盂。

第五节 不得善终：帝王死亡调查

在封建王朝，与皇帝的出生和即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皇帝的死亡。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是国之大事，而死亡更是大事中的大事。无论哪位帝王驾崩，都会有史书郑重其事地给予记载，为后人留下多少不一的历史记录。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中国皇帝表面上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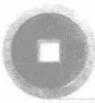


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

而在死亡方式上，更是离奇百怪，各有千秋。据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病死的，也就是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对于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死于刀剑之下的一百二十七人；服“仙丹”死（其实是自己找死）的五人，创伤复发而死的四人；射杀者六人；毒杀者三十三人；勒杀（用绳子）者十四人；扼杀（用手）者二人；饿死者四人；沉杀者四人；闷杀者六人；拉杀者四人；惊死者八人；囚禁或流放致死者六人；被虐杀者一人；自刎者八人；自焚者三人；自缢者四人；投井者一人；投海者一人；落马跌死者三人；酗酒暴死者二人；死因不明者二十七人。至于病死的三百三十九人，是否真的病死，那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其中最搞笑的，有因为小两口拌嘴而被妃子闷死的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因上厕所而掉进粪坑溺死的晋国国君晋景公，因练举重被压伤而死的秦国君王秦武王嬴荡，因跟狗熊练摔跤而被挠死的汉武帝儿子广陵王刘胥，因吃春药过度精尽人亡的明朝光宗朱常洛，以及坐着自己“研制”的舟儿掉在御花园的湖泊里给淹死的明朝正德皇帝，等等。

而最引起人们兴趣的，当属那些死因不明的皇帝，著名的如秦始皇、赵匡胤。而尤其是在清代，自清军入关，多尔



从摄政，定都北京到清朝灭亡，大多数皇帝都不约而同地早夭，引起人们各种猜测，众说不一。雍正之前的几位皇帝，如努尔哈赤死因不明，但或受伤，或病死，或两者兼有，总算大体知道是怎样死的；皇太极则是猝死，是病死还是像小说中写的由于情杀，就不得而知了；多尔衮也是猝死，据说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伤后，吃错了药死的；顺治应该是得天花而死，至于出家则是演绎；康熙，从其数次发病情况来看，患的可能是高血压、心脏病之类，致使晚年心力憔悴，气力不支，病情突然恶化死亡，应该也能说得通；乾隆比较幸运，是老死的；嘉庆也是猝死，据说是雷劈死的；道光和咸丰都是病死的，没有疑问；同治也是病死的，但死因不明，不知道是天花还是梅毒；而光绪的死亡更为离奇，恰恰就死在慈禧的前一天，也为人所怀疑是被慈禧毒死的。

最有传奇色彩和演绎版本最多的，还是雍正的死亡。因为从小营养跟得上，体育锻炼也并未荒废，又养尊处优，也没有什么荒淫好色狎妓、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雍正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处于羸弱多病与骁悍强健之间。这样的体格，益寿延年虽然并不可得，但花甲之寿应该绰绰有余的。但他的死亡年龄却是盛年五十七岁时，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并且是突然死亡。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死亡，没有什么确切说法与证据。据雍正的心腹大臣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各种“不得好死”的说法就产生了。